

《二十一世紀》與我

周保松

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二十周年，說起來，我和它也有將近二十年的緣份。

我第一次接觸《二十一世紀》，是1991年。那一年，我入讀香港中文大學，不久即加入《中大學生報》工作。《學生報》是《二十一世紀》的訂戶，我遂有機會一期接着一期的讀。那時我最喜歡兩本雜誌，一本是台灣的《當代》，另一本是《二十一世紀》。《當代》主要介紹西方的流行理論，我似懂非懂，讀得吃力。《二十一世紀》卻不同，沒甚麼文章是艱澀到我不能理解的，而且討論的問題我都感興趣，遂每期追看，且看得津津有味。我當時特別喜歡那些思想論爭的文章，例如何炳棣和杜維明教授的「克己復禮」之爭、姜義華和余英時教授的「激進

與保守」之辯，以及崔之元教授的「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」引起的熱烈迴響等。對一個初接觸這些問題的學生來說，見到這些知名學者你來我往唇槍舌劍，實在刺激。「科技文化」欄目也是我喜愛的，因為我是文科生，對科學及科技的發展所知甚少，那些深入淺出的文章教我眼界大開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雖然在中大創辦，但會讀它的學生並不多。對我來說，它卻是當時華文學界頂尖的文化思想刊物。原因很簡單，只要看看它的作者群，就知道它幾乎囊括了人文和社會科學界最有影響力



的學者。可以說，我對中國文化的關懷及對當代中國學術界的認識，很多是從《二十一世紀》得來。所以，當年經過中國文化研究所，我總是心懷崇敬。偶然在校園碰到金觀濤和劉青峰兩先生，我雖不敢上前打招呼，心裏卻不無雀躍之情。而作為中大生，看到學校能在「八九」後辦起這樣一份雜誌，也着實感到自豪。

其後我去英國倫敦唸書，定期追讀《二十一世紀》的習慣依然不改。倫敦唐人街有家光華書店，是《二十一世紀》的代理，但畢竟是窮學生，捨不得買，惟有常去「打書釘」。只是那家書店狹小，店主也不歡迎我這類只看不買的人，所以每次只能匆匆翻幾下就得放下。後來呢，大抵太多我這類人，店主乾脆將雜誌加上膠套，於是只能看看封面的標題，再想像一下文章的內容。這種滋味並不好受。後來我發覺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藏有《二十一世紀》。這家圖書館書香味濃，一進去就能聞到那獨有的氣味。無數黃昏，我靜靜躲在圖書館一角，桌上擺滿《二十一世紀》和1970及80年代的《明報月刊》，像餓鬼一樣啃着那些方塊字，直到閉館。我研究的是西方政治哲學，花時間在這些「閒書」上，好像有點荒廢學業。但說來也沒辦法，因為只有捧起這些雜誌，才令我有種「在家」的感覺——那是屬於我的精神文化家園。很多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，這有點不公。香港能容得下《明報月刊》、《百姓》、《二十一世紀》這些雜誌，啟迪無數像我這樣的年青人，並持久地為社會累積起豐富的文化資源，實在不簡單。

再後來，我嘗試投稿《二十一世紀》，因而先後認識余國良和劉擎兩位編輯，並成為好朋友。2002年我回中大任教，因為常常參加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討論會，因此和陳方正、金觀濤和劉青峰等前輩慢慢相熟，大家更經常一起吃飯聊天，讓我多了許多直接請益的機會，也對雜誌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可以說，從讀者到作者再到現在有幸獲邀加入編委會，這段路我足足走了二十年。

二十年前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時，陳方正先生以〈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〉為題，發宏願辦一本多元性的茶館式的思想雜誌，凝聚中國知識份子的力量，共同為中國未來的文化建設出一分力。這二十年來，香港和中國翻天覆地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在方正先生和青峰女士的領導下，一期一期辦下來，引起過無數學術論爭，留下諸多經典文章，並在全球華人知識界建立起崇高聲譽，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。辦一本雜誌不難，辦一本二十年的雜誌卻很難，更難的是二十年來都能一絲不苟和一以貫之。我這個老讀者，在此向所有曾參與編輯工作的朋友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，並祝願《二十一世紀》一直辦下去，且辦得更好。